

上 篇

人类生态危机的  
病源是精神生态错位



## 第一章 对生态理论认识的延展

正如鱼和水、唇和齿的关系一样，地球上的所有事物都是依托别的事物而存在，它同时又是别的事物存在的前提和依据。正是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才网织起了绚丽多彩的世界。我们所说的人类生活在由自然生态系统、社会生态系统和精神生态系统组成的生态系统之中，这也是为了研究的需要而人造的一系列“藩篱”，实际上是没有这个界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与社会是包容在自然之中的人与社会，自然是内含着人与社会的自然。

本章论述的目的正在于，把原本以自然科学视觉出发研究自然领域的生态学理论，延伸到社会、文化领域的电视上，以此作为铺垫，用生态化的视觉和理论审视电视系统，运用生态学中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原理，认识电视作为人的精神生态重要环境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在塑造协调精神生态系统中的关键作用，进而自觉调整并引领对于接受者的文化指令，重塑生态化的价值体系，把人们的行为引向生态化境界。

## 一、从自然到社会的视野延展

### 1. 最初的自然生态视野

茫茫无际的宇宙中，为什么只有蔚蓝色的地球充满着生命？人最初是怎样孕育和降生到这个星球上的？人和周围的一切生物及其他存在物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些一直是这个星球上哲人们长期探索、思考的一个永恒主题。

#### (1) “生态系统”遍布生物圈

19世纪中叶，德国动物学家 E·海克尔第一个提出了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课题，并把“研究有机体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定义为生态学。生态学是人类认识环境、改造环境的一门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也是自然哲学，是包括人在内的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一门系统科学。它的核心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以及互为环境的生物与生物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生态学所讲的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包括环境对生物的生态作用、生物对环境的生态适应和生物对环境的改造作用。作为地球生物物种之一的人，已经凌驾于地球所有生物之上，每时每刻都与地球上的各种环境因素发生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关注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是生态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 A·G·坦斯莱进一步描述生物体与特定环境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生态系统”的概念。后来的几十年里，在坦斯莱的启发引导下，学术界对“生态系统”的概念和内涵不断给以充实和完善，到目前，下述定义相对地被普遍认同：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的范围内，生物成分和非生物成分之间通过物质、能量或信息的交流，构成的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生态学功能单位。这一概念告诉我们：生态学研究的对象包括地球生物圈内的所有存在物，它包括有机物和无机物两种。地球生物

圈的一切生物都不能孤立生存，它们与其所在的环境，当然也包括作为环境因素时的其他生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这里说的非生物成分就是各种环境因素，包括河流、土壤、阳光、空气、气温和岩石等其他物质。生物和非生物的环境通过能量流动、物质循环或信息传递，构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整体。不少学者运用一个简明的公式进行表述：生态系统 = 生物群落 + 环境条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并这样加以表述：任何生物群落与其生存环境之间所构成的一定时空内的关系系统都可以看作是生态系统。由此可见，19~20 世纪形成的生态学，是西方自然科学家们经过几百年的艰苦探索和发现，针对自然现象和自然问题，研究自然界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新兴科学。

所以，我们日常所说的“生态农业”、“生态效益”、“生态食品”、“生态危机”、“生态环境”等语词中的“生态”，其实就是“生态系统”的简称、缩写。

当我们以生态学的原理延展视野来观察、审视我们生存环境中的一切时，就完全可以根据不同的角度划分出许许多多的、大大小小的、不同方面的、不同层次的“生态系统”。

从生态学的理论看，作为生物体的“人”，在一定的时间内，只要与周围不同空间、不同层次的自然的、社会的环境发生作用，就会形成一个个不同的生态系统。一个个家庭、一处处四合院、一座座山寨、一片片树林、一潭潭湖水，都构成了相对意义上独立的一个个生态系统，其内部的生物之间、生物与物质环境之间都在生生不息地进行着能量、物质或信息的相互作用，维持着作为构成这个系统的每个因素之间的平衡。

人类作为生命的存在，与各种环境因素之间构成不同性质的生态系统，并在这些系统中通过自身的自组织、自调节能力与各种环境因素进行能量、物质和信息的相互作用。以一个工人的一天的活动为例：早晨离开以妻子、儿女、居室、院落为环境因素

的家庭生态系统后，立刻就进入了与道路、街区、乘客、交通工具为环境因素的公共交通生态系统，进入工厂后，又到了与工人、机械、设备、产品为环境因素的工厂生态系统，下班后看电视、读报、听音乐、聊天时，又进入到与朋友、电视节目、新闻等其他社会舆论环境因素构成的文化生态系统中，傍晚散步时，又处在与人群、夕阳、河水、林带、草坪、飞禽等为环境因素的自然生态系统中。

从这个意义上看，生态系统不仅广布于森林、原野、群山、湿地、河流、极地等自然界里。也广布于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领域，涵盖地球上的各个非自然的人工系统。可以大到地球生物圈，也可以小到微生物系统。生态系统是难以计数的，它们相互包容、相互交叉、分布于整个地球生物圈内。对于人类生态系统来说，根本原因是因为有“人”这个特定的生物，“人”同时横跨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之中。“人”不仅是自然生态中的一个重要生物因素，更重要的它还是社会生态中的生物主体，同时也是人类精神生态的生物主体。可见，人的整个一生都是在始终不停地穿梭于大大小小的、相互紧密关联的、不同层次的生态系统之中，时刻都无法离开自己的生存环境。谁还能说得出，有什么人，有什么生命体不处于某些特定的生态系统之中而能够独立存在呢？

## (2) 能量、物质和信息作用是生态系统运行的根本

在任何一个生态系统中，生物与非生物的环境是构成一个生态系统的基本构件，它们之间的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则是形成相互关系的前提。有基本构成，有相互作用，才能形成生态系统所说的关系，没有相互作用，就无所谓生态系统。生物体与环境因素之间复杂的作用关系，可以概括为能量、物质和信息三个方面。

能量，是度量物质运动的一种物理量，是物质做功的能力。

在生态系统里，“尽管能量的普遍性似乎为人们所熟知，但它是一种抽象的和难以捉摸的概念。它看不见，摸不着，闻不到，尝不出，那么它是什么呢？”<sup>①</sup> 太阳化解了冰雪，轮船运送了货物，电视激起了情感。这种化解、运送、激发的能力就是能量，它们分别是太阳能、煤转换的热能和精神能量在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方面表现出的能力。生态学意义上的能量的流动是错综复杂的，难以精确计量的。除了倾盆大雨对田野的滋润，地震对于建筑的毁灭，战争对社会财富的毁灭及对人心灵的摧残外，还有诸如蝴蝶的扇动翅膀，狮子的打哈欠，恶人的散布谣言，都属于能量的释放和流动。它们只有能量力度的强弱的区别，然而却是真实存在的。

生态学认为，太阳是自然界一切能源之总源，其高热能量为万物提供了生存所需的热能。太阳能通过生物体与生物体、生物体非生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依次流动。太阳能首先通过光合作用先转换流动到绿色植物之中，使之根深叶茂，充满生机；然后，通过食草动物食用绿色植物，把能量转换传递到食草动物身上，使之强筋健骨，延续生命；再通过小型食肉动物食用食草动物，把能量转换传递到小型食肉动物身上，繁衍种群，参与竞争；再通过大型食肉动物食用小型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把能量转换传递到大型食肉动物身上，使之体魄健壮，保持强势；大型食肉动物死亡后经微生物等化学分解，又把剩余的能量释放到土壤等环境中。能量就是这样，通过食物链在生物与环境之间、生物与生物之间转换传递、分配。

能量的流动是单向的，能量以光能的形式进入生态系统转换为热能，又以热能的形式耗散到环境中。正是太阳的能量，才使地球上的生物绵延不断地繁衍着，在优胜劣汰中完成着进化。如

① J·M·莫兰等：《环境科学导论》海洋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3 页。

果没有了太阳，地球也只能是一片寂静的没有任何生命的星球。

物质，泛指能量的运载者、携带者和转换者，能量必须凭借和通过一定的物质进行传递和流动。没有物质，能量无法传递和流动，就如同没有输热管道、散热器等物质，热量就无法依托它们供热，没有大坝、发电机等物质，自然的水无法发电一样。食草动物吃的树叶、牧草，食肉动物吃的肉食、筋骨等都是承载能量的载体。和能量的流动渠道一样，物质循环是物质通过食物链依次传递和迁移，被其他生物逐级利用，最后经分解者分解，又回归于环境的循环往复的过程。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也称为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也就是说地球上的各种化学物质在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和非生物环境中运转。它分为两种循环类型，一种是在大气圈和水圈中进行的氮、氧、二氧化碳、水等气相物的气相循环；另一种是在岩石圈和土壤圈中进行的磷、硫、钙、钾、钠等沉积物的沉积循环。

信息，从生态学的视觉看，是指由生物和非生物物质传递出来的、带有某种意义的、并能被人或其他生物接收感知后产生一定反应的符号。信息包括物理的信息、化学的信息、行为的信息和营养的信息等。这就是说生态系统的功能除了能量的流动和物质的循环体现之外，还可以通过信息的传递来体现。如地震灾害发生前，生物及非生物出现的各种异常征兆；动物种群之间约定俗成表达某种信号的吼叫声、形体动作表达的信号；自然界的雷鸣、闪电、地震、海啸、刮风、下雨、涨潮、落潮、日出、日落对生物的刺激和征兆就属于物理信息。如蜜蜂遇到天敌时会放射出一种信息素，很快约 50 米内的蜂巢就会倾巢出动帮助，这种信息就是带有化学性质的信息。大众传媒的内容信息、人们的社会舆论信息和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各种文化信息的传播、交流、吸纳、化解、反映等，都是信息的交流和传递。

值得说明的是人类社会系统中的信息交流有自己的特殊性，人不仅是物质的存在，而且是精神的存在。人是能创造符号、运用符号、进行信息交流的符号化动物。“人生活的世界不是事物的而是符号的世界。”<sup>①</sup>人在生产和生活中一点也离不开符号。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与人等环境因素间的信息交流作用大大超过人与环境间的物质和能量的作用。至于说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中，究竟谁的信息交流复杂，很难断言，因为人对自然生态内的信息作用状况知之甚少。

在现实中，能量、物质和信息是不能割裂的，是相互伴随着同时发生的。例如森林发生大火，大火本身就是热能的流动，它是在构成森林的各种自然物质中进行的，其火光冲天、霹雳声响本身又是一种危险的信息符号的传递。

在一个生态系统中，与环境进行能量、物质和信息作用的主体是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和无机环境四部分。如在自然界中，植物和细菌就是最积极的生产者，生产者的任务就是把太阳能，转变为化学能潜藏在绿色植物中。消费者就是从生产者那里，直接或间接地食用植物从而获取营养维持生命的草食动物、杂食动物、肉食动物以及寄生菌类等。分解者就是把动、植物尸体分解成可溶性元素和无机物的细菌、真菌和动物。能量流动的过程本身是物质循环的过程，没有水、空气、土壤、阳光、岩石等无机物环境的参与，生产、消费、分解活动都无法进行。即使人类开发的核能、煤、石油、天然气、风能、水能，都离不开无机物。它们是一个生态系统内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进行能量、物质和信息相互作用的物质基础。

〔奥〕 V·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83 页。

### (3) 中国古代生态思想的独特表述

生态学理论是西方文化语境下的表述，它是学术界普遍公认的、揭示了生物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理论。通俗地看，它也是一种观念、一种方法、一门艺术。其实，在中国古代，中国人已在一定程度上阐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独到见解，并以自己特殊的文化语言广泛地在《诗经》、《礼记》、《尚书》、《周礼·地官篇》、《管子·地员篇》、《本草纲目》等著作中表述了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如《论语》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荀子》讲：“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舜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孟子》讲究“天时地理人和”。《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些因人成事，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顺应自然，师法自然，取乎自然，与自然相通相依，和谐共处的朴素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思想确立了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和自然观。只不过当时的各种生态思想并非是以现代生态学意义上的概念和思维方式出现的，而是以“阴阳”、“八卦”、“周易”、“五行”、“三才”、“天人合一”、“太极”、“风水”、“天道”、“人道”等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语境下的概念形态分散于当时的文学、伦理学、美学、哲学等载体之中，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特质。它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学、诗词、绘画、园林艺术的发展，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生机勃勃、长盛不衰的内在动力。只是在中国古代，没有条件，也没有可能在当时的社会和思想的环境中建立起今天西方意义上的生态学的概念、模型及其理论体系，形成生态科学。

仅从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的起源上看，主要出自图腾和神话。从对动物的超自然崇拜的图腾逐渐走向了对所有自然物的超自然崇拜的神话。图腾崇拜反映了远古人敬畏生命、关心动物之情；而神话表达了万物有灵的信念，“万物有灵，也就是万物皆处在宇宙整体生命的链条之上，因而从珍惜人的生命出发，必然

要渐渐走向珍惜万物；从敬畏生命出发，必然走向敬畏宇宙，敬畏万物。<sup>①</sup>“天人合一”观作为中国古代思想的最基本的特征和最深层的观念，其思想的源头就是中国远古时代的图腾崇拜和神灵崇拜。“可以这样说，远古时代的图腾、神灵文化也是‘天人合一’的，只不过与后世的‘天人合一’观念在基础与性质上不一。”

实事求是地讲，由于中国几千年极为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人们主要依靠主观直觉思维，极大地限制了人们掌握作为学科意义上“学”所需要的、最关键的逻辑思维能力，致使我们不止是在生态学方面，而是在相当广的领域内不能产生科学。黎明先生在《西方哲学死了》中的观点至少可以引起我们的深思和追寻。他认为，西方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了逻辑思维方法，中国人没有；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了仿生的思维方法，西方人没有。中国有“术”乏“学”，自古以来就缺乏富有信仰的神学，缺乏富有逻辑求知精神的哲学。而中国人的智慧完全表现在与西方人的哲学大相径庭的人学上，有着发达的人学。原因是西方人的思维对象的指向是从自然到社会，最后走向人自身；而中国人的思维对象的指向是从人到社会，再到自然。这样，西方人一开始就遇到的是“存在”这个外延无限大，而内涵却趋于无限小的概念。这样的概念容易定义，于是，他们一开始就找到了一个最容易定义的思维起点，促进了他们的逻辑推理的能力。相反，中国人一开始遇到的是“人”这个内涵上几乎无限大，而在外延上为“一”的概念，完全没有在当时产生概念的可能，于是中国人从一开始就丧失了产生概念的严格的抽象的逻辑思维基

<sup>①</sup> 任俊华、刘晓华：《环境伦理的文化阐释——中国古代生态智慧探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版，第 7 页。

同上。

础，这就注定了走向与逻辑无缘的方向。

时过境迁，当代中国学者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孕含的生态思想进行了潜心研究和归纳提炼，其中张正春、王勋陵、安黎哲构建了有中国学科特色和中国人文特色的《中国生态学》理论。它也许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它毕竟触摸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生态思想发展的脉络和核心。该理论把“元气论”、“道统论”、“阴阳论”、“天人合一理论”、“三才理论”、“四象理论”、“五行理论”、“八卦理论”看作中国生态学的理论基础。这些独特的概念体系和思维模式完全不同于当今“生态学”，拥有独特的科学理论和模型方法。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生态思想之所以完全不同于西方生态学体系，根本原因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所以，在对概念的表述上、逻辑的推理上和体系的建立上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从概念上讲，中国古代的生态思想首先有着完全不同于当代西方语境下的生态学的特殊概念。“气”、“道”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概念，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气”、“道”不仅是哲学概念，也是生态学的概念。在概念体系上，另外还有阴阳、刚柔、虚实、乾坤、天地、动静、天、天意、天理、天人合一、三才、四象、五行、六合、元气论、道统论、整体论、中心论、信息论、生物指示、天人感应、万物同命、万物同律、对立统一律、生态奇点、生命理想常数、生态因子对学说、占卜等等。<sup>①</sup>

在理论思维上，阴阳理论是中国生态学的核心理论。中国古人早就说过：“一阴一阳谓之道”、“气者道也”。“气”相当于现代词语中一切物质的能量、信息活动，它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本质，气聚则生，气散则亡。在“气”的基础上孕育出来“元气

张正春、王勋陵、安黎哲：《中国生态学》，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6~66 页。

论”的思想；“道”是宇宙万物内在的本质性的统一规律，就是“整体性”因此往往把有序性称为“有道”、“有规律”，把无序性称为“无道”、“无规律”。“道统论”就是整体把握宇宙、自然、生命、生态、社会的一种整体性原理。中国古代的生态思想与西方生态学的不同思维，也主要表现在“元气论”与“原子论”上。“元气论”是整体论，而“原子论”是机械论思想；“元气论”反映了动态的综合思想，而“原子论”反映了静态的分析思想；“元气论”是一种生态观，而“原子论”是非生态的物理观。因此，《中国生态学》把“元气论”、“道统论”、“整体论”归结为中国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基础是很有道理的。

在其理论基础中，阴阳概念和阴阳理论又是中国生态思想诸多理论基础中最为核心的概念和理论。最初的“阴阳”概念解释为，山南（阳坡）为阳，山北（阴坡）为阴；日为阳，月为阴。慢慢地，“阴阳”概念逐渐地得以延伸，以至最后把宇宙、自然和社会中的凡是相互对立的两类不同性质的事物都归纳分类为阴阳两类，“阴阳”成了解释一切现象、描述一切对立的普遍概念。如宇宙、天地、大小、高低、男女、上下、黑白、动静、虚实、冷热、是否、方圆、缓急、祸福、旱涝等等。《中国生态学》把这些对立的两类事物抽象定名为“生态因子对”。并根据阴阳理论中的阴阳互生、阴阳互补、阴阳互动、阴阳相交、阴阳相克、阴阳相得的思维，衍生出了中国生态学的十大原理：整体性原理、阴阳平衡原理、阴阳互补原理、周期性原理、相生相克原理、生态多样性原理、稳定性原理、生态效应最大化原理、全能性原理和宇宙理想状态原理。并把“阴阳太极图”作为中国生态学的基本模型。

这样，中国人几千年来形成的阴阳理论把世间一切事物、一切现象都分为阴阳。形成了在思维方式、语言、语法、医学、军事、艺术等方方面面的对于阴阳理论的自然运用，并且都完全可

以从“阴阳太极图”模型中得到解释和描述。“‘无往不复’、‘否极泰来’、‘盛极而衰’、‘以柔克刚’都是中国人公认的‘天理’，是坚信不疑的基本信念。‘由此及彼’的推理方法就是使用‘太极图’模型的科学方法：‘居安思危’、‘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因小失大’、‘得不偿失’、‘夜以继日’、‘公而忘私’等等，都是一种模型推导的方法的应用。‘阴阳合德’、‘刚柔相济’、‘动静相兼’、‘名实相符’、‘性情相投’、‘情投意合’、‘权衡利弊’、‘恩威并施’、‘德才兼备’、‘文武双全’、‘劳逸结合’等等，都是非常形象的‘太极图’式的‘模型方法’的应用。”如此等等，这一切“简直就是中国文化的‘公理’”。<sup>①</sup>

无论西方生态学，还是以中国古代为代表的东方生态思想，都是人类关于自我生存环境最宝贵的思想遗产，它们各有其局限性，不是尽善尽美的，最明智的途径就是相互吸取养料，来一次史无前例的巨大综合，形成东西方优秀文化在生态学领域的完美合璧。

## 2. 由分割回归到一统的整体思维

### (1) 划界——区分事物的需要

在人类的眼光里，特别是早期人类，“自然”与“社会”原本是浑然一体的，两者是相通的，相互联系的，没有任何人为的分割和划界。就像人既是自然孕育的产物，它同时又是社会的细胞一样。所以，一般来说，自然问题实质上也是一个社会问题，人的问题。只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社会分工的细化，人工建立的以城市为代表的社会形态的逐渐凸显出来，才有了划分事物类别和确立科学学科的需要和可能。人们对周围世界的认识首先是对它们的特殊性的认识，没有对研究对象特殊性的认识，

张正春、王勋陵、安黎哲：《中国生态学》，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0 页。

人就无法区分纷繁复杂的庞大物质客体。比如按动物能否飞行的特殊性，把它们区分为飞禽或走兽。聪慧的人类开始以某一标准找出其共性，从区别事物中得到对事物的理性认识。这样，人也给原本一体的事物人为地划定了一条条的“鸿沟”。从此，动植物才有了分类的界限，“自然”和“社会”之间才出现了“距离”。反映到人们的意识中，才有了“自然”和“社会”的不同概念及其所指的内涵。

我们从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相互的演变过程来看，也能够充分说明这一点。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是人们面对不同的研究对象，长期孕育和创造出来的两种类型文化，本身也是人为划界形成的。早期哲学家们普遍有一个共同兴趣，就是非常关心世界的本源是什么。当时他们把人和自然看作浑然一体的，没有把人从自然界中特别区分出来，没有当作与自然对立的存在物来看待。他们唯一的兴趣就是努力弄明白世界万事万物的原因。他们几乎都相信有一种或几种世界的本源存在着，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由它们产生、衍变出来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的认识找到这个本源的。于是关于世界本源的种种“世界本源说”就出现了，如泰勒斯的“水本源说”、阿拉克西米尼的“气本源说”、赫拉克利特的“火本源说”、毕达哥拉斯的“数本源说”、阿拉克萨哥拉的“种子说”以及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说”等。后来，这种情形发生了变化，人被逐渐重视起来，以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为标志，哲学研究的重心开始发生了转移。普氏认为人高于自然万物，所以人能支配和安排万物，人最应该看重自己、研究人自己。真正把关怀、研究和认识人类自己作为哲学中心主题的是苏格拉底，他从起初十分关注自然，转而关注对人及人的心灵的探究，他把人的心灵看作是是唯一值得研究的对象，认为真正的自我是灵魂和内心生活。在他的影响下，不少人的注意力随之开始转

向了人文。正是这个时期，标志着哲学在科学传统和人文传统上的分野，宣告了两种哲学文化传统、两种认识态度、两种对世界的关照尺度的出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的证明，人们以特有的通感发现：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不同事物之间，往往有着一些相同的规律，有着内在的联系，背后有着共同的本源。越来越感到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分裂和并行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分化了的两种文化也越来越感到自身单方面的局限性，越来越感到对方对自身互补作用的重要性，逐步看到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的精神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统一性。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两种文化之间似乎有了一种无声的默契，那就是反对将科学与人文完全分离和对立起来，倡导两种文化之间进行广泛的对话的迹象，要求以更加宽容的理解，更加融洽的合作，走科学与人文融通的道路。也许正是近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无论在自然的天空上，还是在社会的领域中，寻求科学与人文的融通是卓有成效的，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在基本粒子世界，物理学家与哲学家找到了共同语言，在天体运行和音符的旋律之间，天文学家 and 艺术家对规律性与和谐性达到了共同的体认，对转基因食物的安全性和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伦理问题，基因工程专家和伦理学家产生了相同的关注点，还有网络时代的到来、网络文化的繁荣，使得网络的技术专家和艺术专家结成了联盟。科技的平台必须也是人性的界面，人文的世界必须增加科技的含量，成为当代文化事业的一个共性特征；科学与人文之间在观念上的互启、方法上的互用、学科上的互构、精神上的互融，正在成为一种日益普遍的文明建设活动。”

终于，一些横亘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藩篱”被逐

渐撤除，不少学科在“握手”中沟通、交叉和融会。就以当前的学校教学科目的试题考核为例，现在的试题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的严格区分，只是在各门知识体系中测试，现在的试题已经打破科目的界限，数学试题融进物理的概念和定理，化学的试题中交汇进了物理、生物的知识。其中生态学也已经不再局限于自然生态范畴，也不再是一门仅仅面对自然界的学问，生态学的原理正在突破自然科学的界限，迅速地扩展、超越、延伸，开始被借用到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文化学等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人类生态学》、《城市生态学》、《社会生态学》、《生态文艺学》、《文化生态学》、《民族生态学》等成果相继诞生。生态学已经衍化为一种人与自然界、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生态关系的崭新价值观。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属于人文文化的电视文化系统借鉴和吸收属于科学文化的生态学原理，审视、建构生态化的电视系统，就显得十分必要和极其自然了。“我们不仅认为自然生态是人文生态的背景，而且认为人文运动本身也是生态性运动，是天地人的综合生动之状态。”<sup>①</sup>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断言：属于人文文化的电视文化与属于科学文化的生态文化之间，原本来自人类创造的同一个本源，没有理由成为相互对峙的、毫无关联的对立双方。电视文化与生态文化之间没有“藩篱”。本论探讨用生态学的原理渗透于电视，使其“生态化”，对电视媒体及其传播者从最高层次上理解电视节目精神能量在人的精神建构上产生的特殊作用，进而在实践中如何适度、合理、准确地运用电视对人的精神信息能量，对确保人的精神和谐、社会健康运行，自然生态平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理论意义。

<sup>①</sup> 董欣奇、郑奇：《魔语——人类文化生态学导论》，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1 页。